

# 对大龄女性的恶意标签该撕掉了

恋爱、结婚与生育本来就是女性的自由,属于个人选择,他人无权去干预与限制。

范娜娜

这是一个遍布焦虑的时代。中产焦虑、教育焦虑、职场焦虑……焦虑千千万万,女性焦虑从不缺席。贩卖女性年龄焦虑、婚恋焦虑的内容,充斥在舆论场的角角落落。

此前,赵雷一首《三十岁的女人》唱道:“她是个三十岁,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歌词里对于30岁的女性的怜悯之意溢于言表。

这种对大龄单身女性的臆断并不是个例。近日,一则更有魔幻色彩的新闻进入了大众视野:杭州一位姑娘因为30岁还没结婚,父亲被同事骂,自己找去理论又被气

到住院。

“你女儿都30了,还不嫁人,丢不丢人?”这位姑娘父亲的同事理直气壮地讽刺,并且拒绝道歉。这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穿越了: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人如此迂腐,这么看待大龄女性?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下的广泛社会语境里,这类对女性的深深恶意与歧视屡见不鲜。30岁未婚被归为“剩女”的行列,是被评头论足、待价而沽的对象。人们基于一厢情愿的揣度,凭空妄言,在大龄单身女性身上贴上失败、不幸福的标签。

从汉惠帝时期“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的“剩女税”,到如今大城市相亲公园里的女性贬值论,社会对于大龄单身女性的残酷对待,古往今来有之。

但问题是,恋爱、结婚与生育本来就是女性的自由,属于个人选择,他人无权去干预与限制。30岁的单身女性不该被如此冒犯,30岁单身女性的父母更不该承受这份扑面而来的难堪。

谁规定了结婚嫁人要有年龄的门槛和界限?30岁了,就一定要结婚生子吗?这种如同旧时代裹脚布一样的观念,不仅让人犯呕,更让人心寒。这种狭隘的视角、偏颇的价值观、思维的定式,才是丢人的所在。因为它不仅削弱了女性的独立性,更是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贬低。

长久以来,30岁仿佛是对女性下的一个魔咒。跨过这道线,迎接女性的不是如同男性一样被追捧,而是接连不断的相亲 and 周围亲友的花式催婚。仿佛30岁还不婚不育就是女性的原罪。从大众传媒到身边的舆论,整个社会仿佛都陷入了这种观念的囚笼。

但是,时代已经变了,结婚率创下10年新低,离婚率节节攀升。一个人的前路与归途,不止有结婚生子这个选项,不该再

用传统枷锁捆住女性的人生。

对于当代的新女性来讲,爱情并不是她们唯一的明灯,男性也并不是她们唯一的陪伴,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最美的时光并未溜走,为何一定要随便找个人依靠?

纪实访谈节目《女人30+》里记录了娱乐圈里几位30岁以上的女明星,她们有单身但依旧怡然自得的,有已婚也不放弃自我事业的,不管怎样,她们依然豁达又通透,坚毅而温柔。不管是20岁上下的青春年华,还是40岁以后的中年,都是人生的正常阶段,总要继续走下去,一往无前。

就像陈乔恩的那句反问一样:“为什么总有些不相关的人,比我自己更关心我的年龄和生活状态?”当岁月轰轰烈烈地袭来,那就这样吧,别管他人的看法,用一腔勇气与果敢对抗世俗,且活得自在精彩。

放过30岁的女性吧,女性结婚生育与否,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她们也不是“剩女”,而是正当“盛放”,人生的多样性还在徐徐展开。



## 慎重选择

新学年即将到来,校外培训机构成为许多家长、学生关注的热点。湖南长沙县日前公布了一批非法无证校外培训机构名单,这些机构收费混乱、消防隐患等问题频出。教育部门提醒家长学生要理性选择,自觉抵制非法无证办学。

新华社 程硕 作

# 信用不是筐,什么都能装

制定信用标准,既要考虑于法有据,也要努力做到于情合理。

王庆峰

乘客在地铁车厢内公放音乐、视频的不文明行为,令许多人倍感头痛,除了劝说外别无他法,还常常引发争执。近日,昆明市交通运输局亮出了新招,其新修订的《昆明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规定,不得外放声音,否则将列入失信黑名单。无独有偶,有媒体发现,北京、兰州等地此前都已作出规定,将车厢内饮食、大声公放、逃票、从事营销活动等不文明行为记入个人信用不良信息。

不文明行为之所以屡禁不绝,或是因为它只属于道德事物,介于个人自由和公共秩序之间,极易形成不自觉的冒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通常对道德边界缺乏省思,因此会犯错而不知错,甚至去“怼”别人。毫无疑问,将这样的人列入黑名单,乃至于一处失信、寸步难行,可以形成良好的约束作用,让他们更重视社会公德的养成,但也正如许多人所追问的,一次不文明行为是否可以代表一个人的道德全貌?一次无意的失信行为,是否必然意味着“寸步难行”的

惩戒后果?

闯红灯上失信黑名单、教师用课本打学生上黑名单,学校招生先看学生父母是否失信……现在,随着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失信惩戒机制的“提速换挡”,“信用机制被滥用”的担忧也随之而来。首先,现在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在制定相应的信用规范,但一些地方随意降低失信认定标准,无法完整体现信用主体的品行,客观上也养成了一切以信用解决的制度惯性;其次,惩戒层面上,信用机制有滥用风险,一切事物均可与信用扯上关系,对人们的生活会造成极大困扰。

种种问题,指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作为一种制度信用,有其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有效性边界。换言之,信用机制不是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针对这种现象,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特别强调“三个防止”,防止失信行为认定和记入信用记录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失信“黑名单”认定和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泛化、扩大化;防止包括个人信用分在内的其他信用建设举措应用的泛化、扩大化。

## “退休后再说”是掩耳盗铃

只有清廉才是最好的“护身符”。

孟庆毅

近日,湖南省郴州市人防办原主任白广华严重违纪违法事实被公之于众。其中,“在任职时替人办事,退休后收人钱财”这一点在白广华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多数是在其退休后单独或共同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总计327万余元”。每有请托人想感谢他时,他总讲的一句话就是“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

“退休以后再说”,既暴露了“无利不起早”的贪婪本性,也折射出“退休后再‘变现权力’更安全”的侥幸心理。梳理近年因贪腐落马的干部,像白广华这样在任时大搞“投资”却不急求“回报”,而寄希望于“长线交易”“期权兑付”的不在少数。例如,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原巡视员杨先静,受人请托办事并不收“好处费”,却在退休前后短短半年时间里,通过打“时间差”和打借条等方式大肆收受财物……凡此种种,不过是权钱交易行为期权化的“障眼法”罢了,妄想通过避免权钱“直接”交易,延长权钱交易时间跨度,达到规避查处风险,躲过党纪国法惩处的目的。

诚然,较之“你给钱、我办事”“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等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期权腐败无疑具有更强的隐蔽性,给执纪执法部门查处带来更多困难。然而,期权腐败的危害性已经受到了高度重视。党纪处分条例中对党员领导干部离职或者退(离)休后违规任职、营利等行为作出相应处分规定;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的相关行为作出规范和约束;各地也出台了规范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离职后从业行为的规定。除了扎紧制度笼子以外,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期权腐败案件的严肃查处,也证明搞期权腐败不过是掩耳盗铃的把戏,哪怕机关算尽也躲不过执纪执法者的“火眼金睛”。

干部任职有期限,惩治腐败无时限。只要伸了不该伸的手,拿了不该拿的钱,做了不该做的事,不管身在一线还是退休离职,都不会“一笔勾销”“既往不咎”。只有清廉才是最好的“护身符”。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如果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吃亏的只会是自己。

可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固然“好用”,但我们也要保持冷静,坚持依法依规,合理适度。

制度信用的边界在哪里?北大教授沈岍提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是要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诚信社会、‘完人’社会。”笔者以为,这应该是一条需要牢记的底线。我们制定信用标准,既要考虑于法有据,也要努力做到于情合理。针对一般不文明道德行为,可以从行政处罚里找办法,针对违法违纪行为,又有专门性的法纪规范进行制约。只有那些严重损害其他人利益的失信行为,比如食品药品领域重大违法事件,被规定执行却不还钱的“老赖”等,才可以纳入失信范畴。

当前,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大量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文件,对比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传统信用概念,现如今的“信用”,正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有无所不包的势态。对于管理部门来说,以信用倒逼个体行为,无疑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着眼于信用制度的严肃性,相关部门要对这种“立竿见影”保持谨慎态度,能用既有制度解决的,就不必要寻求信用救济。在综合考虑到社会危害等影响的前提下,一部分行为可以使用信用规制,以发挥出警示作用。